

虚拟空间多陷阱 遥远距离无障碍

寂寞学子如何鉴别

高颂雅

在全球网络互联的今天，网络的隐秘性和广覆盖性让骗子们将手伸得更远。随着我国留学生数量日益增长，国内一些网络骗子利用其情感寂寞、涉世未深和经常与国内亲友上网联络等特点，越来越多地把行骗目标瞄准这一群体。

骗子画像

瞒天过海——

玩哪些花招？

花招一：盗取号码骗亲友

目前最常见于国内网络的行骗方式，是骗子们盗取留学生的QQ、Skype等社交网络账号，冒充留学生本人与其家人、好友联络，以缺少生活费、补交学费、帮朋友治病等借口，骗取身在国内的家长和朋友的钱财。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骗子们的花招有所升级，他们会抓住留学生常常寻找打工机会、租房信息、二手车交易信息的特点，在网络上散布这方面的虚假信息并与留学生进行视频聊天交流，然后再用录制好的被盗号留学生本人的视频骗取亲友的信任。

花招二：情财诱惑骗本人

海外留学花费较高，“省钱”和“赚钱”常常是留学生心中的两件大事。骗子们往往会自称某公司招聘、销售或投资等部门负责人，或是提示留学生中大奖、中彩票的“好消息”，或者是声称能够为留学生提供更好的省钱、赚钱的渠道。

由于多数人对“天上掉馅饼”心存戒备，骗子们也学会了一套先骗信任再骗钱的演绎手法。留学生普遍到了婚恋年龄，又不太容易在国外找到相同文化圈的恋爱对象，这为骗子们制造了机会。在美国留学的一位女同学便是一个例子。已在国内工作了几年了她3年前决定出国继续求学。赴美1年后，由于年龄关系，家人常常催促她赶紧结婚。她在一北美著名华人婚恋网站注册后，很快找到一位“有缘人”，那位男士自称在香港某公司事业有成，对女士又温柔体贴。抱着感情与信任，这位女留学生相继向他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投入了约10万美元，等到这位男士突然从网络上消失后，她才醒悟到这是一场骗局。

花招三：演绎逼真骗感情

网络骗子们编造的故事和演绎的情节都力求详细逼真，诱骗的过程不再只是紧扣“钱”这一主题，而是会增加很多真实的感性材料。在美国留学的一位博士，几个月前刚刚经历了一场网恋诈骗，回忆起受骗细节，他说：“我是做科学的，很注重细节。她（骗子）说她父母都在浙江丽水，父亲做木材加工，母亲是家庭妇女还有糖尿病，自己还有一个妹妹，说的细节很多，也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感觉那些细节有可能是真实的。”这样，他不知不觉就落入网络骗局之中。

相关链接：

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拟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达到诈骗罪标准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网络骗子



网络诈骗案件在海外多发，留学生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网络骗子骗财之后莫不以“消失”告终，受害人不久就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发现受骗后该怎么处理？又如何进行网络安全防范呢？

专家支招

面对网骗——留学生咋办？

对策一：到收款账户所在地报案

发现受骗后，留学生们往往在焦急之下选择向自身所在地的警方报案。在“两颗红豆网”上遭受诈骗的受害者们却在美国警方那里碰了钉子。由于受害者并非美国公民，且汇款目的地也不在美国，美国警方对这样的案件并不具备刑事管辖权。就此，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李海峰提示，如果发生类似案件，一般由收款账户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受理；如果金额较大，则应委托律师报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骗子提供的账户不在受害者所处的国家，报案过程将更费周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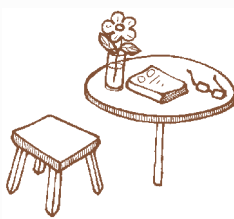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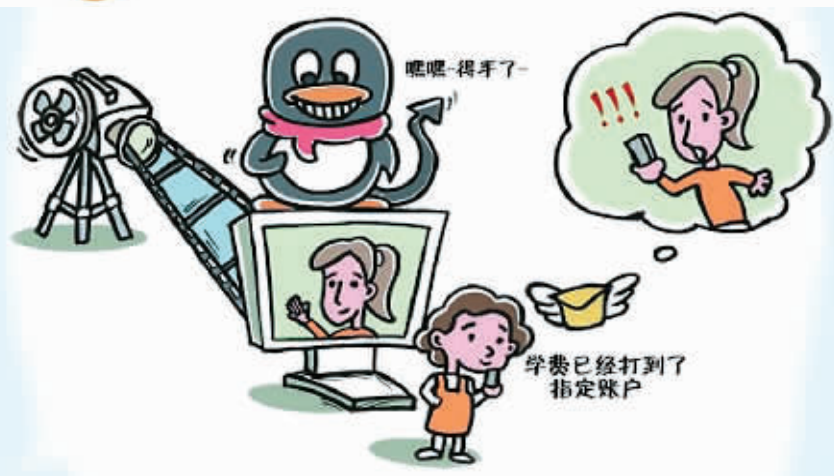
另外，对于此类案件，公安机关的侦查也会面临一些困难。李海峰律师提到，如果收款账户在国内，多数地方的公安机关对这类网络诈骗的侦查经验有限；有些情况是账户虽然在国内，但犯罪人却在海外，还需要国外警方跨国协助。

对策二：大成本维权不如做好防范

海外留学生遭受网络诈骗后，维权成本比较大。留学生们首先要顾及自己的学业，维权将耗去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最后犯罪嫌疑人能够落网，警方从初查到立案再到办案、判决，也会经历较长的周期。而就受害者们最关心的受骗金额能否追回的问题，李海峰律师也提到，如果能确定犯罪人取得的钱款就是受害者一人所汇，会退还受害者。但很多时候受害者不只一人，追回的款额不足以支付所有受害者，则只可能按比例退还。

与其花费大成本追回损失的利益，不如提高警戒心理，做好防范，不给网络骗子们可乘之机。由于骗子会通过广撒网来增加成功的概率，通常会用同样的名称与资料注册不同的社交网站，这就给了海外留学生们一个识破骗局的机会。例如在一个网恋诈骗受害者自行组织的QQ群里，有几位受害人渐渐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的同时，遇到的骗子其实早已被国内“世纪佳缘网”列入黑名单。

总之，留学生及其家长与朋友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群体，应该更多地关注新闻了解时事，增强自己的辨别能力。



一桌一椅一世界

如何将网络工具更好地引入教学大概是目前全世界各类教育机构最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别看英国传统（精英）教学文化深厚，但因为其也一直强调学术资源的开放、共享与灵活教学，因此在引进数字化和网络化方面，英国教育界大概比很多国家都积极。比如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是在线学习系统Moodle的世界第二大用户。而在刚刚结束的英国预备中学独立协会的年会上，英国独立学校考试院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中学升学考试将全部改为电子试卷，以后进考场可就不用橡皮、铅笔喽！

我想大概每一个读者，和大多数英国的学生和家一样，都会觉得将新科技引入教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举个最实际的例子吧：在大多数年轻人习惯了键盘和触摸屏的时代，期末考试时忽然让他们用圆珠笔这种“生疏的介质”写2个小时的答卷，不少学生会抱怨提笔忘词。另外一个似乎在学生圈里很受欢迎的变革是大学里的授课方式。随着各种名校网络课堂及民间网络讲堂的兴起，进课堂这件事似乎变成了一件天经地义不需课程表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在每一间教室里安装自动录音录像设备，老师上完课，课堂影像自动上传到网上，以便学生按自己的时间、喜好随时随地下载听取复习。

虽然理论上网络教学的方便这么多，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其实在实际教学中，即便那些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不离手的学生也并非对网络化完全买账。比如，同一门课，如果不对学生出勤率做任何要求，而是向学生提供全部课堂录像，提供全自主的学习方式，那么最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体验满意度可能都比传统教学模式低。同理，如果综合阅读材料只提供电子版，方便学生随时随地下载，而不提供传统纸质装订合集，期末也会有很多学生抱怨阅读量低，学不到东西。这个和我们一般观念相矛盾的现象很有趣，而且听很多同事说，也算是个普遍现象，似乎不只是因为个别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欠缺这么简单。

我问学生为什么对在线教学不买账。他们说，因为不少学生觉得既然课堂上的东西会在事后公开在网上，似乎就没有必要来参加课堂讨论，缺少了很多同学之间互动的机会。当学习变成了只和自己有关的私事时，就少了很多刺激与趣味。确实，别看学生对安排小组调研和集体报告等综合作业的课程起初会发怵，觉得有难度，但如果“强制”他们组成小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合力解决问题，并给予适当指导的话，每每作业大功告成之后，很多学生反而津津乐道于这些合作经历。

这让我想起最近《福布斯》杂志中一篇题为“在线教学才是下一个泡沫”的评论文章。文章以美国常青藤大学学费持续飙升为例，指出传统大学人气不减，尤其好大学能提供优秀的人际交往圈，其优势仍不可取代。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觉得网络教学还大有潜力可挖，但这倒也体现出校园学习的精髓来：其实校园给学生提供的最重要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一种学习氛围，或者说是一种有利于知识增长的生活环境。

(寄自英国)

英国学生眼中的网络教学

张悦悦

1905年9月，顾维钧（1888—198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

当时正赶上清政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察来到美国。作为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顾维钧参加了欢迎考察团的活动，还陪同五大臣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可以说，顾维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联系。

那时，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由世界各地著名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比如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这些名家的课，顾维钧都选过。

不过，顾维钧不是书呆子，他经常参加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还进了《旁观者》编辑部，从副编辑干起，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旁观者》的工作很艰巨，但这段经历是很有意思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它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

后来顾维钧还担任《哥伦比亚月刊》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编辑，参加法语学会等，真可谓精力过人、能力过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各种族的学生都交朋友。”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受益于此，他在三年级被全体学生和教师选入学生代表委员会，负责与学校当局打交道。

1908年，顾维钧收到通知，说他已经读完了规定的124个学分，有资格毕业

百年留学

顾维钧：

一心求学却“被毕业”

熊建

了。顾维钧却找到注册主任，说不想毕业。“由于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旁观者》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等。”他如此解释。

后来注册主任给顾维钧出主意，可以拒交25美元的毕业费，然后就把他的名字去掉，并在报告中说明，顾维钧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

1909年，顾维钧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员，并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两年，他学了法学院除有关司法程序之外的所有学科。

顾维钧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指导教师穆尔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还很少有人论述。

辛亥革命前后是顾维钧最忙的时节，一方面在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为论文做准备，一方面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1912年2月，顾维钧收到一封公函，邀请他去拜访民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过了几天，顾维钧利用周末前往。张荫棠说收到总统袁世凯的秘书长发来的电报，邀请顾维钧去袁世凯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这让顾维钧大吃一惊，他对张荫棠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博士学位做准备……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学业要重要得多。”（《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张荫棠说不动顾维钧，穆尔能。他说，读博士是为了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现在有很好的机会，不能拒绝。顾维钧还是担心学业。穆尔说，口试嘛，哪天举行都行，至于论文，你的引言部分不是搞定了吗？我看了看，足够当论文了。其他不足的地方，回国路上写，寄回来就成。就这样，顾维钧“被毕业”了。